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

壹、研究動機

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脫離日本統治時期，重回祖國的懷抱，在此前後，台灣的政治活動曾一度復甦起來，然而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成為一個歷史的傷口，使本土菁英知識份子消滅殆盡，剩下的少數驚弓之鳥，幾乎沒有人敢再談論政治問題，台灣的民主運動也因而出現了斷層現象。

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節節敗退，最後播遷台灣，隨著政府來台的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，此時也將自由民主的種子散播至台灣，《自由中國》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創刊。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正處於內外交迫的困境，欲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重振旗鼓，故《自由中國》的反共理念乃受到執政者的歡迎，並資助其出刊¹。

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創刊於1949年11月20日，至1960年9月1日發行最後一期為止，一共發行了將近11年²，無疑地，《自由中國》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政論雜誌，它不僅引介了自由民主的思想，更進一步的將其理念落實為具體的政治行動，雖然最後《自由中國》的組黨運動因雷震案無疾而終，然而其發展脈絡卻具有歷史的傳承意義，《自由中國》的言論及主張也與日後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一脈相承³。

¹ 當時《自由中國》的出刊受到教育部的經費補助（傅正主編，1989-1990（31）：349）。

² 《自由中國》發行的最後一期為第23卷第5期。

³ 王杏慶在《八十年代》所舉辦的座談會發言，即特別強調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對民主運動之連續性意義（傅正，1982：25）。余英時也指出《自由中國》後來雖因政治迫害而結束，但是民主、自由的種子終於流傳了下來。今天台灣民主運動和反對黨的重大發展，在思想上是繼承了《自由中國》。

《自由中國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（1949-1960）

如上所述，《自由中國》對於整個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，有其不容抹煞的關鍵地位，析論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、基本理念及組黨運動，是掌握台灣 1950 年代黨外運動發展的重要工作之一，故筆者擬從《自由中國》著手進行研究，欲了解台灣當時的政治及思想層面的開展過程，進而探究《自由中國》在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中的地位及其影響。

貳、研究目的

筆者選定《自由中國》作為研究主題，希望透過各種資料的收集整理，進而分析這個對台灣黨外運動具有重要意義的政論雜誌，以了解台灣民主運動的進程。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：

- 一、探討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，並研究其思想言行對台灣黨外運動的影響。
- 二、分析《自由中國》的基本理念，並研究其思想主張對台灣黨外運動的啟發。
- 三、論述《自由中國》的組黨運動，並研究該行動對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意義。
- 四、瞭解《自由中國》與當時（1949-1960）政治環境間的互動，並試圖建構當時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風貌。

第二節 研究途徑、方法與架構

壹、研究途徑

的傳統（余英時，1990：109）。

歷史研究途徑 (historical approach)

歷史研究途徑是對於過去已發生的各項資料，包括事件、年代、人物與制度等，進行系統性的描述與分析，並解釋各部分之間的前後因果關係，其目的是希望藉由對歷史事實的描述，來發掘出某一特定時空的各項事實間有些什麼連貫性及因果關係，並以此因果關聯對過去的現象加以重建，甚至創造出研究法則。使用歷史研究途徑，將為各項看似獨立的事件建構出聯繫關係，此一做法不但擴展了我們的研究視野，更可藉以改進研究者僅對於單一事件觀察所產生的盲點。

基於此，為了對《自由中國》作一整體觀察，故採歷史研究途徑，希冀藉由過去的歷史及資料文獻以做出分析，貫穿過去的歷史，分析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、基本理念與組黨運動，以及《自由中國》對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影響，藉由此一歷史回顧，找出相互之間的關係。

貳、研究方法

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與個案研究法兩個研究方法，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文獻分析法 (documentary analysis)

文獻分析法又稱為資料分析法，是藉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，為間接研究法的一種。文獻分析法的使用在一般學術層面來說是非常普遍的，在某個限度內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與重建過去，解釋現在並推測將來，故適合用在描述性研究。

文獻分析法的特色為：1. 研究的事件是過去而非目前發生；2. 可超越個人的經驗與視野；3. 可超越調查互動中的不良影響；4. 可提供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（葉至誠、葉立誠，2000:138-140）。而文獻分析法的功能則為：1. 透過文獻了解當時人的想法和動機；2. 了解事件發生

《自由中國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（1949-1960）

的過程、經歷的階段以及每一個階段起作用的是哪些事件。認識歷史的發展具有偶然性，重視由某一些當時發生的特定事件，及其所帶動的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；3. 了解當時涉入事件過程有哪些人物，這些人物各是來自什麼背景，持著什麼立場（石之瑜，2003：199）。

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為主，廣泛地蒐集相關的報紙期刊、出版專書、學術論文、座談研討會記錄，以及實際參與《自由中國》編輯及組黨人士的著作、傳記、回憶錄、書信、日記等作為主要參考資料，藉此探討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、基本理念及組黨運動，並研究該刊物對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影響。

二、個案研究法（case study）

個案研究法是以特定事件或個體為對象，其功能偏重在「客觀事實的瞭解」及「主觀的解釋」。個案研究不只可以提供我們有關個人、組織、社會以及政治現象的知識，同時個案研究在心理學、社會學、政治科學以及規劃上也已經是相當普遍使用的一種研究策略（張紹勳，2004：287）。

歷史結果是經過長期的累積，但是在某些情形下，歷史發展亦出現重大且影響未來深遠的事件，在台灣的政治發展史上，《自由中國》仍處於戒嚴統治的時代，情治機關對於社會的控制還是隨時可見，但是政治活動並未因此而銷聲匿跡，《自由中國》所提倡的理念及其所發動的組黨運動，對後來的台灣民主政治產生了明顯的影響，故我們在探討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、基本理念和組黨運動時，運用個案研究法可深入瞭解其脈絡，因此能對《自由中國》作一全面的分析。

參、研究架構

《自由中國》創刊之初，雜誌創辦者或主導者與中華民國政府的

互動關係良好，他們將自由主義的思想轉化為文字，透過《自由中國》這份刊物，宣揚其民主自由的理念，並主張擁蔣反共，因此，基本上，它是一個傾向中華民國政府的政論性雜誌。

然而，《自由中國》的自由民主理念卻和當時蔣介石急欲建立的強人威權體制背道而馳，因此，《自由中國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乃由親近而愈趨惡化。《自由中國》作為知識份子的政論刊物，其理念卻難以透過執政當局的政策施行加以實現，於是《自由中國》試圖跨出了純粹言論刊物的本質，進一步尋求理念的實踐，至此，《自由中國》遂成為籌組反對黨的機關刊物。

總而言之，《自由中國》本身的發展，對於 1950 年代台灣的黨外運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，並且持續地開擴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，它所訴求的主張，也成為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目標。今日，台灣能有如此豐碩的民主成果，《自由中國》確實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。基於上述，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-1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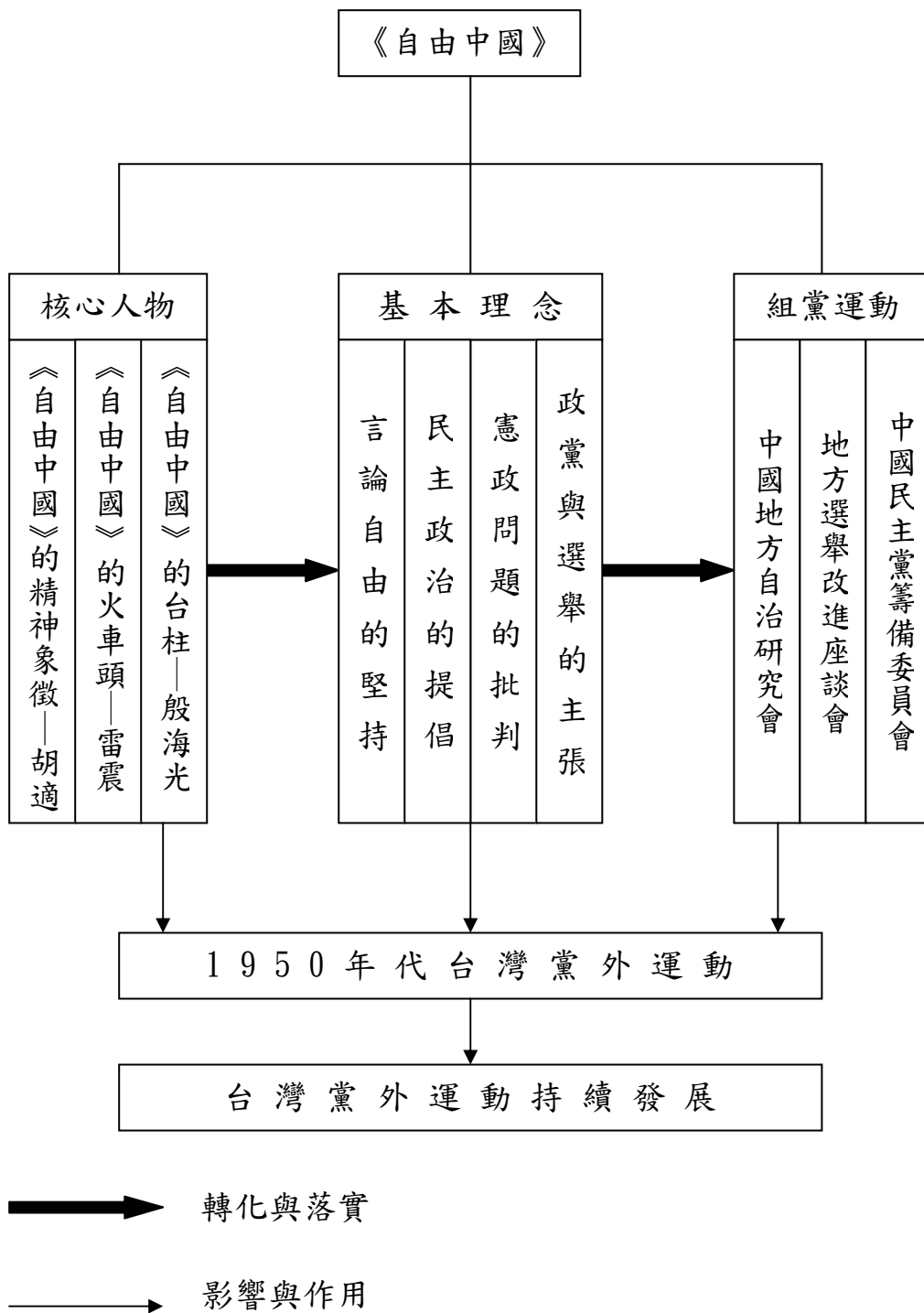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1 研究架構圖

資料來源：研究者自繪

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

壹、研究範圍

《自由中國》的理念是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濫觴，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源頭之一，要分析這樣的政論刊物就不能不回顧 1945 年以來台灣政治情勢及社會環境的發展與變遷，如此才能清楚地建構《自由中國》在台灣黨外運動發展史中的定位與意義。

因此從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開始，到 1986 年民主進步黨的創立，這四十多年間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都是本研究關照的時間範圍。不過，本研究以《自由中國》為主題，而《自由中國》自 1949 年創刊至 1960 年終止，因此，其中將近十一年的發展為本研究主要的時間範圍。

當然《自由中國》在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中的角色與定位，必須配合對其核心人物、基本理念、組黨運動的考察，而作一全盤性的解釋，才更能確切地掌握其中的精要，故筆者擬從上述這些主題切入作為本研究之內容範圍。

貳、研究限制

本研究的主要重點是分析《自由中國》從 1949 年至 1960 年這段期間的開展，進而探討其在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中的定位，以及何以《自由中國》會具有影響台灣民主運動的效用。

由於《自由中國》這份刊物距今已經過四十餘年，對於當時刊物的演變進展，只能依據現有的出版書籍、學位論文、報章雜誌、書信

《自由中國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（1949-1960）

日記、回憶錄、口述歷史等，作文獻內容的分析，故無法就史料內容作歷史真相的考察，而史實與文獻記載恐有差異，其中所產生的詮釋誤差，是一種先天的限制，恐怕難以避免，此為研究限制之一。

其二，雷震繫獄十年曾撰寫多達四百餘萬字的回憶錄，卻在刑滿出獄前夕，被國防部新店軍人監獄沒收，下落不明，其後，除了日記部分已經家屬索回，其餘文稿皆被焚毀。2002年國史館宣布尋得了一部分雷震獄中日記、信函的手稿，至於各界所關注的回憶錄，則是找回了一些斷簡殘篇的文稿，不過不是手稿原件，而是情治單位審查判定為內容不當的文稿影本⁴，此為本研究進行文獻分析時的一大缺憾。

其三，影響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因素眾多，絕非《自由中國》單一面向，但本研究以《自由中國》為研究重點，無法旁及其他相關因素的探討，因而關照層面僅止於《自由中國》的層次，這是一種侷限。不過，雖有上述部分的限制，仍不至於影響本研究的成果與價值。

第四節 名詞界定與文獻探討

壹、名詞界定

一、《自由中國》

本研究所指之《自由中國》乃是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這份政論雜誌。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創刊於1949年11月20日，至1960年9月1日發行最後一期為止，一共發行了將近十一年，共23卷5期。《自由中國》掛名的發行人為胡適，但是推動《自由中國》這個雜誌創生的人是雷震，雷震也是《自由中國》實際的主導者。

⁴ 當年情治單位劃出雷震回憶錄內容中被判定為「不當」部分，加以影印存證，作為銷毀雷震回憶錄的根據，這意味著雷震獄中回憶錄還是沒找到（雷震，2003：15）。

二、黨外

李敖認為「黨外」這個說法早在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北伐完成後到對日抗戰期間即已出現，1963年時中國國民黨（以下簡稱國民黨）總裁蔣介石已使用「黨外」一詞區分黨內外⁵。

1959年國民黨第八屆二中全會，當時黨務人員提出之組訓工作報告，針對1958年縣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，將當選台中縣正副議長的非國民黨人士，稱之為「黨外人士」⁶。

國內自1950年代中期以後，使用「黨外」一詞的風氣慢慢傳開。1956年4月，青年黨機關刊物《民主潮》刊載一篇名為〈一黨議會的自然現象〉的短評，文中批評立法院議事效率低落的原因出在沒有政黨競爭，「因為黨外沒有敵對力量可與抗衡，黨內派系自然產生……」（軍武，1956：20）。

《自由中國》第15卷第10期，刊載了一位讀者的投書，該位讀者寫道：「使候選人變為一位的，大多係當地縣市黨部主任委員為顧全自己位置，用壓力迫使違紀競選黨員及黨外人士放棄競選所致，更因一班治安人員穿插其間，黨外有膽識之士，懍於『特權』，自然不敢與鬥矣」（陳紹基，1956：31）。

李筱峰指出：「『黨外』一詞，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籍的一個泛稱，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，多以『無黨無派』標榜，而少用『黨外』一詞。自從黃信介、康寧祥崛起後，『黨外』一詞大量使用，無形中『黨外』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議份子所共同使用的號誌（李筱峰，1987：122）。」

⁵ 1928年胡漢民提出「黨外無黨，黨內無派」的一黨專政主張，並不承認其他政黨的存在。蔣介石在1963年的「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目標方略」演說中有一段話這麼說：「目前正有某些存心訕謗之徒，在指責我們『直把杭州作汴州』，有志荒意滿的現象，這雖然是屬於黨外惡意的謗傷，但是大家仍然應該以『聞者足戒』的心情，格外警省惕勵。」（李敖，1995：1-4）

⁶ 1958年縣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，選舉結果，二十一縣市中除台中縣正副議長為黨外人士獲選外，其餘正副議長均照本黨提名人選當選者有十六縣市，本黨同志違紀當選者有四縣市（陳鵬仁，1998：411）。

綜上所述，「黨外」一詞有下列兩項定義：其一，站在國民黨的立場，用黨外黨內來區分敵我，以辨識國民黨與非國民黨人士。其二，站在反國民黨的立場，用以指涉非當時執政黨之在野黨人士及無黨無派人士。

三、黨外運動

根據上述「黨外」一詞的界定，本研究所指之「黨外運動」乃是站在政治反對的立場，以反對當時執政之國民黨為標誌，所推展的一連串集體行動，此種行動是以組織化或集團化的方式所進行的改革訴求和運動，其目標在於要求實施民主法治、維護人權、提倡自由、改革弊端，並包括贏得選舉、取得執政。

貳、文獻探討

與本研究有關的前人重要研究成果，可概分為三大類：

一、以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為研究主題

傅正主編（1989-1990）的《雷震全集》，共有四十七冊⁷，將雷震的日記、書信、著作整理出版，保存了雷震一生的言論、雷震案始末、雷震入獄之後到逝世之前的心境，使研究者得以使用原始史料，並能得知人物內心的想法。

張忠棟（1990）的《胡適、雷震、殷海光——自由主義人物畫像》一書，乃數篇論文的集結，以彼時尚未出版的雷震日記、信件為主，討論雷震及其主導的《自由中國》與執政者的互動關係，並完整地敘述雷震走向組黨之路的心路歷程。此外，張忠棟更著眼於胡適、雷震、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來台初期的貢獻，層層剖析其思想風格的異同，道出箇中不見容於政府當道的辛酸歷程，並藉此彰顯他們艱苦奮鬥的

⁷ 《雷震全集》編號共四十七冊，實際出版四十三冊，缺編號第七冊《雷震平反記》、第二十四 - 二十六冊《中華民國制憲史》。這是傅正耗費十年時間與心血，整理雷震遺稿，獨力完成的巨作。

精神。但是對於《自由中國》核心人物的探討則稍嫌簡化。

澄社主編（1992）的《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》一書，是由澄社主辦，於1990年9月7日至9日在桃園國際機場旅館舉辦的學術研討會，論文後來集結出版，為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除研討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的思想及其重要意義外，特別側重台灣在民主發展過程中有關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教育等問題的探討。但該書對於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較缺乏全盤性的論述。

任育德（1999）的《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》一書，著重於探討雷震的生平及其民主憲政思想的醞釀、轉變及闡揚，並試圖勾勒出雷震從民主憲政思想的倡導者、啟蒙者，到實際組黨落實民主理念，挑戰威權政體的轉折，由此呈現出1950年代台灣政治的走向。但對於雷震的意識形態與思想內涵分析上則著墨較少。

二、以《自由中國》的內容、思想為研究主題

魏誠（1984）的碩士論文《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》，為首篇以《自由中國》的內容、思想為研究主題者。魏誠以內容分析法處理代表社方意見的社論，將之分為十項議題：1. 軍公教待遇問題；2. 出版及言論自由問題；3. 美援問題；4. 軍事問題；5. 地方選舉問題；6. 地方自治問題；7. 省籍問題；8. 中央政府體制問題；9. 法統問題；10. 反對黨問題。但是並未進一步探討各議題的思想意涵。

錢永祥（1988）的〈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：對《自由中國》經驗之反省〉，則在魏誠的研究基礎上，以政治秩序為主軸，輔以西方學者觀點，分析《自由中國》政論的意涵，對於自由主義在《自由中國》的展現，有相當說明。但是並未論述《自由中國》在1950年代台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。

《自由中國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（1949-1960）

顏淑芳（1989）的碩士論文《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政黨思想》，探討了《自由中國》政黨思想的背景及其政黨思想的特色。此外，並約略的介紹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發展以及探討其失敗的原因。但是對於歷史時空與政治思想間互相激盪的討論，則有所不足。

薛化元（1996）的《《自由中國》與民主憲政——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》一書，對《自由中國》有關民主憲政的政論文章，進行量化分析與分期，從而得出五期：交融期（1949年11月-1951年5月）、摩擦期（1951年6月-1954年12月）、緊張期（1955年1月-1956年9月）、破裂期（1956年10月-1958年12月）、對抗期（1959年1月-1960年9月）；之後討論民主憲政思想與環境的互動。該書甚有見地、頗具洞見，且對本研究之分析架構提供相當參考。

三、以《自由中國》的組黨運動為研究主題

林濁水（1982）的〈薪盡火傳——中國民主黨組黨始末〉一文為這方面的先驅性研究。他從歷史（分別追溯到中國的清末民初以及台灣的日治時期）和社會的角度來分析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，從而認定它是一個由戰前大陸的自由主義者，以及日治時代台灣民權運動者所從事的「舊時運動的餘波」。林濁水已嘗試分析組黨運動失敗的原因，但本文屬於紀念性與回憶性文章，欠缺嚴謹的學術性研究。

顏志榮（1993）的碩士論文《光復後台籍民選精英政治反對之研究（1945-1969）》，其中有專章討論「中國民主黨」的組黨運動，並論述台籍精英在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中的角色及作為，對於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理念之形成及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之籌設與動員均有深入的探討。

蘇瑞鏘（1995）的碩士論文《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之研究》，

著重於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的相關論述與實際組黨的過程，為目前對組黨運動具全面性研究者。但對於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與 1950 年代台灣政治社會變遷的關聯上則著墨較少。

《自由中國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（1949-1960）